早期中国 希望的田野

卜工

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使得早期中国已然不是简单的学术课题，更非物质文化的单纯叙事，而是揭示人类早期发展规律的宏大工程。

早期中国是考古界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泛指中华古文化古文明发生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考古资料与日俱增和研究深度不断推进，精准定义和深层研读的条件已然成熟。

早期中国 不是独唱

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是世界性课题。她落户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就是早期埃及（Early Egypt），落户西亚的两河流域那就是早期美索不达米亚（Early Mesopotamia），落户东亚的中国，那自然是早期中国（Early China）。由于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生活方式与文明进程的各领风骚，世界因此而色彩斑斓，丰富多彩。然而，早期创业筚路蓝缕，那些说不尽的艰苦卓绝，业绩荣光早已被历史尘埃所掩埋，荡然无存。“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的叩问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值得庆幸的是，近代考古学的崛起能够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历史研究因此形成早期发展与历史时期两个部分。前者是考古学的战场，后者是文献史学的舞台。人类早期发展的研究主要依托具体的物质形象，因而，早期中国是拥有别样精彩的大千世界，格外引人入胜，令人向往。器以藏礼，物以载道，是此时积累认识的唯一途径。世界文明古国大都有此经历，从具象物体到抽象概念也是认识世界的普遍规律。

经过百年的发展与积累，中国考古学的文化与学科建设均取得长足进步和突破性进展。第二个考古百年虽然刚刚起步，但学科研究的迭代升级却格外抢眼。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使得早期中国已然不是简单的学术课题，更非物质文化的单纯叙事，而是揭示人类早期发展规律的宏大工程。换言之，今天的中国考古已经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创造出“延伸历史的轴线，活化历史的场景，丰富历史的内涵”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深层次的研究呼之欲出。

早期中国有三项研究独树一帜，堪称圭臬，值得称道。

其一，英籍汉学家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首倡早期中国的概念。1975年，他在《早期中国》创刊词中，将“中国史前及商、周、汉时期”界定为早期中国。他提出中国文化根植于农耕，强调早期中国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分工与大规模动员社会劳动力的能力，注重集体而非个人，以祖先崇拜的宗教体系强化家族角色，强调礼仪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并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两个文化共同体。

其二，1978年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发表。区系类型理论横空出世，成为早期中国研究的核心理论，为中国特色研究指明了方向，推动考古学文化建设的理论化和中国化，成为中国考古学永恒的经典理论。

其三，1986年，张光直在《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也称“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认为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起，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通过密切交流，形成一个共享文化精粹的史前文化共同体。该观点在他的《考古学专题六讲》中作了进一步阐述，在中国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西方考古理论。

年代界定 提上日程

不同地域的早期发展如何确认其初始阶段？答案是因地而异，酌情处理。中国的研究表明，陶器的出现是本地区人类早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考古学能够观察到的社会基本细胞，是早期历史遗存中最活跃的要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可以成为判定早期中国是否出现的依据。

鉴此，过去关于早期中国年代上限始于万年的认识就需要重新界定了（卜工，《中国模式解读早期中国》，科学出版社2011年）。其上限应提到距今两万年，其下限应延至秦统一中国之前，如此，才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历史周期。

第一，江西万年仙人洞原始陶片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就是距今两万年。早年，苏秉琦先生说过，我国有万年的文化史，如今的考古资料丰富发展了苏先生的论述，两万年文化史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史实。俗话说“水涨船高”，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深入，早期中国的概念扩充与丰富完善乃是势所必然的常态。完全可以相信，以苏先生那样的远见卓识，其实早就期待着这种改变的到来。倒是那种刻舟求剑式的背书，则是要时刻警惕的教条主义现象。

早期中国上下两万年，纵贯五大河，在古代世界独领风骚。从五大水系的全局来看，有的地方已进入国家进程的轨道，有的尚游离于轨道之外，还有的地区仍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因此，早期中国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考古学文化的连续性，阶段划分的准确性，更要关注考古遗存的历史定位和社会进程的曲折性，社会治理体系的差异性，国家形态的多样性。显然，这是早期中国深度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文明整合的历史动因。

第二，早期中国的年代下限定在秦统一之前，是考虑到“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历史周期的完整性。此后，中国进入到以郡县制度为基础的帝王国家，如此扩充，让王国文明与帝国文明的连接线索更加紧密，也让联姻联盟、家族联盟到国家联盟的历史取向更加鲜明。

第三，早期中国至少拥有六个显而易见的阶段：

一是2—1.3万年（以下年份均为距今），洞里藏身厚积待发；二是万年伊始村落点点，上山贾湖无比惊艳；三是8000年文化繁荣满天星斗，大型遗址遍布中华；四是6000年社会狂飙古国崛起，红山文明主导整合；五是5000年城池林立方国登场，英雄时代尧舜禹汤；六是4000年王朝大国柔远能迩，夏商周王前仆后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早期中国稳定发展、贯穿始终的是：文化类型的多样性，文明整合的长期性，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多元一体的包容性。

文明整合 有史可考

中华古文明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经过了漫长的整合周期。这个周期以牛河梁古国的酝酿为起点，以黑龙江、辽河、黄河、长江、珠江为纵深，由北向南波次推进，历史大潮洪流滚滚（卜工，《文明整合历史洪流》，中国文物报2026年4月25日）。文明整合与制度建设是中华文明的“任督二脉”、底层逻辑和治理特色，也是“多元一体”的必由之路，这个不争的事实早已为地上地下资料共同证明，成为特色鲜明的中国史诗。

先秦文献将早期中国的文明整合归为三个时期：一是黄帝时期，二是尧舜禹时期，三是夏商周时期。文明整合的时间表显示，最初的行动始于黄帝的涿鹿之战。《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有研究考证红山文化牛河梁古国就是黄帝的遗存。如今，涿鹿所在的河北张家口地区，发现大量红山文化的遗存，印证了涿鹿之战的真实性。

然后，黄河流域的尧舜禹把整合的目标瞄准了长江。《尚书·舜典》记载“窜三苗于三危”，《尚书·大禹谟》详述禹征有苗的誓师之辞及“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的结局，《禹贡》《益稷》等篇也有涉及。《墨子·非攻下》保留了禹征三苗战况最生动的描述，如“日妖宵出，雨血三朝”“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瑞令很可能就是牙璋）。

考古资料表明，到了殷墟前期，这一历史性的整合才宣告胜利完成。《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便是历史的结论。此时，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晚商大墓，吴城文化等考古资料都足以明证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所以，我在《文明整合历史洪流》一文中最后说，上古时代悠悠岁月，文明整合如火如荼，国家进程方兴未艾，历史洪流不可逆转。倘若对此缺乏清醒认识，那就不能认识黄河流域龙山时代崛起的原因，就不懂得方国与邦国的考古学意义及其在国家化进程中的位置，更难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的类型多样性，如此，何以知晓文明整合是“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必由之路呢？

早期中国的文明整合是历史逻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成因所在。其中，源于黑龙江饶河小南山的青白玉在牛河梁的出现，是东北地区文明整合的发端。而辽河整合黄河流域最为激动人心，是原生文明主动性的真实体现。黄河整合长江流域文献记忆最为清楚，是两种古礼体系的长期角力，长江整合珠江流域始于高庙文化，用时最长。总之，文明整合是从北至南，波次推进，虽有反复，大势不变。当然，文明整合还有另一种模式。那就是文献记载的巡狩、宣讲与融合等其他的方式。

方国城池 暗藏玄机

距今五千年，早期中国步入方国时代。这是考古上的龙山时代，也是历史文献长期讴歌与缅怀的英雄时代。城池崛起英雄辈出，尧舜禹汤各领风骚。此时城池的特点非常显著，择其要者大体有四：一是土木结构难以保存；二是数量众多形态多样；三是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四是性质有别功能不同。因此，深度的比较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城池的规模与面积上，要像庖丁解牛那样，尊重事物的天然结构和本来规律，考察城池的遗存结构和布局关系，方可推定其性质与功能。研究的抓手是核心区的遗存结构与布局关系，而非其他。

什么是核心区？窃以为，城池的宫殿、宫城这些中枢部位就是核心区。例如，良渚古城的中枢是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南佐的中枢是两重壕沟围绕的九座台基，陶寺古城的中枢是30万平方米的宫城，石峁古城的中枢是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皇城台。

从布局特点上看，良渚莫角山以宫殿为中心，内城外城呈中心放射式布局，南佐九台向心式，陶寺那样大小双城的互动式，还有石峁古城那样的高台瞭望式。根据结构决定性质的原理，这些不同结构特点当与城池的功能性质息息相关。

先秦时期的诸侯国往往拥有几处都城。燕国有上都下都之分，晋国有“下国”与“上国”相对，秦楚也有多个都城。张光直先生则尖锐地说到，都城也有“圣”“俗”之别。他强调：三代（夏商周）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是祖先宗庙的基地；另有若干迁徙不定的“俗都”，是王的政、经、军领导中心。由此可见，都城或王城也有性质的差别，以及定性定量的研究需求。

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古蜀文明三星堆古城，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王城那样简单，而很可能是中华文明核心制度的传播圣地，或称夏人册封的南方礼教中心。

首先，礼仪制度是三星堆古城的社会支撑。青关山特大建筑与“坑坑有主题、座座讲制度”的宝藏坑群，揭开了古城性质的冰山一角。宝藏坑的标型器更是直接把制度“写”在脸上。其中，二号坑的器物板块演绎巡狩制度的阵容，三号坑骑兽顶尊铜人说的正是秬鬯献祭的裸礼内容，七号坑的铜网锁玉一望可知是占卜仪式的实用器物，八号坑的青铜神坛就是长江版祭天大典的微缩景观，把中原流行的祭天、礼地、巡狩、占卜等仪式制度用他们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呈现出来。至于那些瘗埋典藏、星阵布局、牙璋重器更是从中原地区直接拿来的制度。这些器物的板块明确，阵容结构清晰，巡游宣讲演示的性质显而易见，因此，并非属于传统意义的宗庙重器，而是制度宣讲的教具（卜工，《上古制度》，科学出版社2025年12月）。

其次，夏文化因素在三星堆古城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在三星堆文化分期中从不缺席。夏文化典型礼器陶盉与牙璋（瑞令）的研究，都为此提供了证据。这种情况令人想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葬。在那里，二里头文化的爵鬶组合是头等大墓随葬品的标配，是二里头文化酒礼册封边疆邦伯，“长臂管辖”管理北方军事要塞的铁证。无独有偶，夏家店大甸子墓葬的彩绘与金沙遗址神人木雕的彩绘竟然别无二致，C型纹样的发现完成了夏文化礼制基因在古蜀文明中的又一张拼图。先秦文献表明，尧舜禹汤之所以“柔远能迩”，就是因为内外服制已经成熟。舜帝南巡、夏礼辐射便是完美的证据链。原来，“多元一体”的“体”竟然就是制度体系。

第三，有鉴于此，大甸子墓葬和三星堆古城都极有可能是被夏人册命册封的边疆邦伯。只是文献疏于记载而已。一个是北方的军事重镇，一个是南方的礼教中心。过去，一般认为三星堆古城的夏文化因素，可能是夏王朝的移民，但为什么他们只有礼器，而生活器皿却极度缺乏呢？由此足证，制度管控在三星堆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若然，良渚中心放射式的城池属于圣王之都，九台向心式的南佐可能属于联盟之都，城中有城的陶寺属于尧王之都的可能性很大；高台瞭望式的石峁古城很可能属于北方的礼教之都。这或许是解读石峁城墙中玉器不同来源的新思路。显然，二里头遗址的夏都也需要功能与性质的检视。

学术高地 希望田野

早期中国是考古学开拓的学术高地，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希望田野，是拓宽中华文明研究的大舞台，让中国特色更鲜明，中国风格更清晰，历史呈现更真实。同时，也为其他学科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多学科知识理论汇集交织，多学科信息资源相互促进，早期中国已然成为跨学科、世界性的学术高地。

早期中国是文明史诗的滥觞阶段。其中，有五种原创性研究最受关注：一是物质文化的发展体系，即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二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体系。其研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种植农业的发生，南稻北粟的格局，水利工程的设计，观象授时遗存的建设，都体现了早期中国的生存智慧。三是公共设施的营造体系。村落、城址、宫殿、陵墓、祭祀圣地等大型项目建设都需要统一规划，整体施工，中华文明的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管理水平都在这些遗存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四是前面反复强调的制度创造的社会治理体系。五是神秘深邃的崇拜信仰体系。只有这五大体系均有高质量、成规模的新思想新体系，才能讲好早期中国的故事。

早期中国是传统文化的沃土。满天星斗、文明整合、多元一体的认识都已经成为历史逻辑而载入史册。所以，深度研究必定是物质文化与理论逻辑的完美统一，是思想深度与制度创造的相得益彰，仅仅依靠材料的罗列不可能形成学术体系，更不要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显然，早期中国将成为全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希望田野”。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云冈学的体系构建

——基于文化传承与学科发展的双重维度

何建国

‘云冈模式’长期被视作艺术传播范式，其背后蕴含的国家治理、文化整合的理论内涵，尚未得到充分阐发，这正是当代云冈学理论建设需要接续完成的工作。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指示为云冈学从零散的专题考证迈向独立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回望百年学术历程，云冈研究历经田野调查、造像考释、艺术鉴赏的积累，逐步萌生学科自觉。但客观来看，多数研究成果依旧依附于考古学、北朝史、佛教艺术史等传统学科，云冈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建构，始终是亟待补齐的突出短板。

云冈石窟是北魏平城时代国家营建工程的物质遗存，不能简单视作孤立的艺术标本。它与平城都城遗址、贵族墓葬、碑刻题记、丝路出土文物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中古北方文明实证链条。当前云冈学正处在学科成型的攻坚阶段，实物资料持续丰富，但理论提炼、价值阐释、范式建设相对滞后。不少研究停留于资料梳理与现象描述，缺少对遗存背后文明运行逻辑的深度解析；学科边界时常走向两极，或是无限制泛化外延，或是窄化为单纯的石窟艺术赏析；文物保护、历史考据、公众阐释各板块彼此割裂，难以形成统一自洽的学术话语。基于此，本文以理论建设与价值阐释为主线，辨析云冈学的学科内涵，剖析当下研究热点与内在症结，探讨“理论—研究—支撑—应用—创新”五位一体学科框架的实践路径，推动云冈学成长为具备本土问题意识的交叉应用型学科。

云冈学的学科界定：从资料整理走向理论自觉

一门学科能否成立，不只取决于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要看是否生成专属的问题意识、阐释逻辑与理论话语。长期以来，云冈相关研究多属于依附性研究：考古学者专注洞窟分期，艺术史学者解析造像风格，历史学者梳理北魏佛教政策，各有建树，却较少站在云冈学本位提出统摄性学术命题。

云冈学是以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本体，以北魏平城作为地理与社会场域，以4世纪至6世纪中国北方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核心问题线索，融汇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民族学、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的交叉应用型学科。其研究目标不局限于考证洞窟年代、梳理造像纹样，更致力于回应一系列深层命题：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大一统政权，如何借石窟这一物质载体完成意识形态建构；外来佛教信仰如何在多民族社会土壤中实现本土化转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双向浸润，如何共同塑造中华文明内在肌理；大型石质文化遗产应当建立何种“保护—研究—阐释”的内在逻辑。

研究对象形成三层圈层：核心本体涵盖云冈石窟洞窟形制、造像谱系、纹饰题记与窟前遗址；关联遗存包括平城大遗址、周边中小型石窟、北朝墓葬、碑刻石刻；文化辐射区延伸至北方草原、中原腹地，兼顾欧亚东部文明互动的历史背景。三层圈层互为支撑，规避将云冈学压缩为单一洞窟研究的局限。

学科具备三重内在特质，亦是理论建构赖以扎根的现实基础。第一，民族性与包容性辩证统一。云冈是北魏皇室主导的国家级石窟工程，昙曜五窟保留雄浑厚重的草原审美取向，中期洞窟吸纳中原汉式衣冠、龙凤瑞兽纹样，第12窟音乐窟汇集多地域乐器形象，直观呈现“戎华兼采”的文化面貌。这里的理论任务，不是简单罗列胡汉文化元素共存现象，而是阐释多元文化如何经由国家力量整合，沉淀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云冈学区别于一般石窟研究的核心标识。第二，历史性与现实性贯通。云冈学以中古物质遗存为对象，但研究归宿不能仅仅停留在复原古代史事。石窟见证的民族交融、文明互鉴经验，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外文明对话提供历史参照。这种“以史鉴今”，不是对历史做功利化附会解读，而是依托“史考互证”挖掘遗存本有的时代价值，划定云冈学理论阐释的边界。第三，专业性与综合性兼容。石窟分期断代、砂岩病害研判、图像题记释读，都要求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研究横跨人文社科与工程技术，需要田野考古、文献考据、材料检测、数字化建模协同推进。多学科交叉不等于不同领域成果简单拼接，而是围绕云冈学核心命题开展有效学术对话，这也是当前理论建设的现实难点。

梳理学术脉络，陈垣、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开启近代云冈田野调查；宿白先生依托碑刻与考古类型学建立云冈三期分期，提出“云冈模式”，奠定重要学术基石。唐长孺、马长寿等学者又从北朝制度史、北方民族史层面拓展研究边界。前辈学者的研究极具启发，为云冈学理论的建构奠定扎实的基础。但“云冈模式”长期被视作艺术传播范式，其背后蕴含的国家治理、文化整合的理论内涵，尚未得到充分阐发，这正是当代云冈学理论建设需要接续完成的工作。

当下云冈学的热点议题与理论困境

近年云冈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长，热点集中于“云冈模式”内涵拓展、帝王庙窟性质辨析、佛教中国化实物实证、“平城—石窟”一体化研究。但繁荣表象之下，理论建构短板日益凸显，诸多学术争议停留在现象比对层面，缺少统摄性阐释框架。

首先是“云冈模式”的理论再阐释。宿白先生提出这一概念之初，重点指向洞窟形制、造像风格向外扩散的艺术范式。近年学界不断拓展其内涵，不再局限艺术传播，延伸到北魏国家意识形态塑造、都城—石窟联动关系。部分学者围绕昙曜五窟帝王庙窟命题展开讨论，将洞窟开凿和北魏皇权更迭、鲜卑祭祀传统相关联。但现有讨论仍存在明显局限：一部分研究将“云冈模式”简化为一套向外输出的艺术模板，另一部分将其拔高为完整的北朝文化整合范式，二者之间缺少清晰的理论界定。究竟其内核是艺术形态，还是一套涵盖政治、宗教、审美的文化建构机制，学界尚未形成共识，多数论文止步于材料比对，缺少对模式生成内在逻辑的理论提炼。

其次是佛教中国化与民族交融的阐释困境。学界可以清晰捕捉造像服饰由袒右袈裟向褒衣博带的风格转变，但对于变化背后的文化机制解读分歧较大。一部分观点将其归为单向汉化，外来佛教持续被汉文化改造；另一部分强调双向融合，鲜卑固有信仰习俗同样参与石窟面貌塑造。可直接题记材料有限，大量推论只能依靠图像比对，文献与图像难以完全互证。由此形成理论困境：我们能够描述“发生了什么”，却很难完整回答“为何如此发生”。胡汉之间是制度强制改造，还是社会层面渐进双向浸润，这一核心命题，亟待云冈学构建专属阐释框架予以回应。

再者是“平城—石窟”一体化研究的理论缺口。过去研究常常割裂云冈石窟与平城都城，把石窟视作脱离城市社会的独立宗教场所。如今学界普遍意识到，云冈石窟是平城都城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需要结合明堂遗址、宫城遗存、司马金龙墓、嘎仙洞石刻共同还原5世纪平城文明图景。但窟前遗址后世扰动严重，考古报告整理周期漫长，实物资料释放有限。更为关键的是，“都城物质遗存—石窟图像遗存—传世文献”三者互证的分析范式尚未成熟，很多研究只是简单罗列几类材料，并未打通社会制度、都城营建、石窟开凿之间的内在逻辑。

伴随热点议题，云冈学理论建设面临四重现实难点。第一，基础材料供给与理论建构失衡。尽管《云冈石窟全集》已经出版，但窟前遗址考古报告、题记铭文校释、装饰图像整理等基础工作仍存遗留。宏观理论讨论层出不穷，微观扎实考证供给不足，极易造成理论悬浮，缺少遗存材料支撑。学科理论不能建立在碎片化推论之上，必须扎根系统完整的实物资料。第二，多学科交叉流于形式，理论对话不足。考古、历史、艺术、保护技术各自产出成果，却缺少围绕云冈学核心问题的对话。技术团队掌握岩体检测、数字化建模手段，对北魏社会背景理解有限；文史学者熟稔文献，对砂岩风化、石窟保护现实约束缺少认知，人文与技术相互脱节，难以生长兼顾历史真实与遗产保护现实的本土理论。第三，价值阐释的理论边界模糊。云冈遗存承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阐释实践出现两类偏差：部分研究脱离实证做过度现实引申，把历史遗存标签化；另一部分固守纯粹考据，回避遗存自带的社会价值。如何把握“历史真实阐释”与“时代价值挖掘”的边界，建立严谨的价值阐释理论，是绕不开的命题。第四，大众阐释与学术理论脱节。社会充斥大量脱离实证的娱乐化解读，学术圈层成果又难以转化为公众可理解的内容，学术理论向公共科普转化缺少成熟指引。

立足理论建构的五位一体学科体系

云冈学体系构建不是研究内容的简单拼接，应当把理论建设贯穿“理论—研究—支撑—应用—创新”五位一体框架全过程。史料、方法、价值构成底层支撑：史料根基坚持实物遗存为主、文献记载为辅、数字化资料作补充；方法根基坚持传统考据与现代科技检测深度融合；价值根基统一学术、文化、社会、时代多重价值。

理论体系是学科走向独立成熟的核心标志，也是当前最薄弱环节。其一，推进核心命题理论建构。深耕三大方向：一是北方多民族交融阐释，依托“云冈—平城”成套遗存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生成路径，跳出“汉化/胡化”二元叙事；二是构建石质大遗址保护本土理论范式，立足云冈砂岩病害特征，总结适配我国石窟寺的保护价值理论，避免直接照搬域外经验；三是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理论，厘清文物本体价值、历史研究价值、当代阐释价值的边界，规避过度阐释与符号化解读。重新解析“云冈模式”，区分艺术传播与文化建构两层内涵，完成核心概念的学理升级。其二，确立学科内部规范。梳理关键术语、研究对象分类标准、成果评价导向，扭转重现象描述、轻理论提炼的倾向，鼓励立足本土遗存提炼问题，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石窟研究框架。组建学术规范委员会，推动学界就核心概念、阐释边界形成共识。其三，布局交叉理论方向。打通考古—历史、艺术—宗教、保护—材料、数字—传播四大交叉板块，以云冈学核心问题牵引不同学科，而非堆砌学科成果。依托云冈学理论研究中心，针对帝王庙窟、佛教本土化、平城—石窟联动等争议议题开展专题攻关，逐步形成统一阐释话语。

面向未来，云冈学建设需要把握三项重心。第一，摆正基础材料与理论建设的关系，以扎实遗存整理为根基，持续推进核心概念、核心命题的理论提炼，完成“云冈模式”、帝王庙窟、平城—石窟联动等热点议题的学理升级。第二，理顺理论研究与现实阐释的关系，建立严谨的价值阐释理论，厘清历史本真与当代引申的边界，以学术成果规范展览、研学、大众传播，防范符号化、娱乐化解读。第三，持续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不盲从域外研究范式，把植根中国遗存生长出来的理论认识向外输出，提升本土学术话语权。

（作者单位：云冈研究院）

三版、四版责编：续红明 杨逸尘 丁淑娇

出版单位：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 本社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电子邮箱：wwb@zgwwb.cn 邮政编码：100007 总机：（010）84078838 发行热线：（010）84079040
广告热线：（010）84079692 周二、四、六出版 零售价：2.00元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